



长征路上彰显建军初心的红军布告

在中国国家博物馆,珍藏着一件极具标志性的革命文物——1935年5月22日,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。这件纵36.5厘米、横36厘米的油印文献,纸面虽历经91年岁月洗礼已微微泛黄,156字的六言韵文字迹依旧工整清晰、力透纸背。作为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“长征”概念的历史遗存,这张小小的油印纸,不仅是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前的关键政治动员令,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、群众工作、民族工作的纲领性范本,承载着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的初心使命与建军根本。 王博实

这篇布告的诞生,源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生死抉择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,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,中国革命迎来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。随后,中央红军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,彻底跳出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,兵锋直指大渡河天险。此时的红军身处生死困局:前有川军重兵布防大渡河沿线,后有薛岳十万追兵紧逼不舍,蒋介石叫嚣要让红军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,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南岸。而横亘在红军与大渡河之间的,是绵延数百里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。近代以来,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阀、地方奴隶主的双重压迫,造成了彝汉民族间的深刻隔阂。

红军入境前,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“红军烧杀抢掠”的谣言,煽动敌视情绪,红军前卫部队多次遭遇拦阻袭扰,甚至出现武器被抢、物资被扣等情况。面对这一局面,红军始终坚守人民军队性质宗旨,坚决摒弃旧军队“武力开路”的野蛮做法,选择用党的民族政策、严明军纪与真诚态度打破隔阂。这篇布告应运而生,为红军突破困局筑牢了政治根基与群众基础。

这篇短短26句的六言布告,看似是一篇战时安民告示,实则蕴含着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核心逻辑,其

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早已超越时空,在多个维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这篇布告彻底打破了旧政权文告晦涩生硬、官样文章的固有模式,采用彝族群众耳熟能详、朗朗上口的六言韵文形式,将党的政治主张、红军的革命宗旨,转化为群众听得懂、记得住、传得开的通俗语言。尤为重要的是,布告中首次以正式文告形式提出“红军万里长征,所向势如破竹”的重要表述,将此前的战略转移升华为有着明确政治目标、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征程,赋予军事行动鲜明的政治属性,实现了政治引领与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。

布告开篇便亮明核心立场:“中国工农红军,解放弱小民族;一切夷(布告中的夷人、夷族即彝族)汉平民,都是兄弟骨肉”,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第一次以公开文告的形式,面向少数民族群众作出的郑重宣示,将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的主张落到了实处。布告痛斥四川军阀“压迫夷人太毒”的深恶罪行,郑重宣告红军“军纪十分严明,不动一丝一粟;粮食公平购买,价钱交付十足”的纪律要求,用最直白的语言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界限。正是以布告宣示的民族平等政策为核心遵循,才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

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“彝海结盟”的千古佳话。红军不仅毫无阻碍地顺利通过百里彝区,更赢得了彝族群众的真心拥护,在当地播撒革命火种,组建了第一支彝族人民革命武装。

布告不仅是安民告示,更是一篇面向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令。文中明确号召“凡我夷人群众,切莫怀疑畏缩;赶快团结起来,共把军阀驱逐”,清晰阐明红军的革命目标,不仅是实现战略转移,更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,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。它将红军的军事行动与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深度绑定,把战略转移的过程转化为宣传革命主张、动员人民群众、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。正是依靠这种植根人民、团结人民的根本立场,红军才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,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,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。

这篇布告所确立的政治引领、民族平等、群众路线的根本原则,不仅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,更为红军后续长征途中经过藏、回、羌等多个民族地区提供了根本遵循,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、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,深深融入了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冰心弃医从文

冰心因为妈妈身体不好,她少年时期原本立志学医。1919年,19岁的冰心考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,准备预科班毕业后正式学医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,原来并不十分关心政治的冰心,此时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,参与罢课、游行和演讲。在这一过程中,她看到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和民众的麻木,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民族的危机后,深深体会到,身体的病痛可以用药医治,但国家的腐朽、人心的苦闷、精神的伤痛,医术却无能为力。

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冰心的人生轨迹,她像鲁迅一样,走上了“弃医从文”的道路。听从时代的召唤,她放下学医的理想,转而投身文学,开始以“冰心”为笔名写文章,给报刊投稿,用文字书写

母爱、童真、自然,书写人间苦难与温情。

她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《两个家庭》发表在《晨报》副刊上,广受好评,激励她正式转入文科学习,并于1921年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。

转入文学道路后,冰心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问题、歌颂母爱与童真的作品。如问题小说《斯人独憔悴》,揭露封建家庭对人性的禁锢;诗集《繁星》《春水》,以清新纯净的笔触表达“爱的哲学”;散文《寄小读者》系列,奠定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冰心以“爱”为核心,将母爱扩展为对人类的大爱,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,用文字传播进步思想,实现了从“医治身体”到“医治灵魂”的升华。

贺新花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邹韬奋投稿

1915年,家道中落的20岁青年邹韬奋陷入经济绝境。在上海南洋公学的阅报室里,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上“请领稿费”的启事,让他燃起了投稿求生的念头。

最初的投稿经历充满了青涩和困难。因为缺乏经验,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。思索多日,邹韬奋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:他钻进学校图书馆,翻阅体育、科学方面的英文杂志,从上面选取一些关于卫生健康、科学发明之类的短文章,翻译出来后,试着投稿。一开始寄出的稿件如同石沉大海,然而,这并未消磨他的意志,他依旧伏案疾书。

转机在一日清晨悄然降临。邹韬奋习惯性地翻开新刊报纸,副刊版面上“谷僧”二字赫然入目,这正是他给自己取的笔名!他反复核对署名,良久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月底领稿费那日,他与二弟邹恩泳攥着新刻的印章,一路小跑奔至棋盘街的申报馆,领到了6块大洋,兄弟俩喜出望外,

激动不已。

后来,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学生杂志》成为他的新目标。彼时杂志名家云集,杨贤江、萧公权的文稿让他心生敬意,也暗自发誓较劲。他摒弃了单纯的译述,转而聚焦南洋公学千余名学子的真实境遇,撰写学生修养类文章,篇幅也从数百字扩展至数千言。“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”,这句从实践中悟得的箴言,让他的稿件录用率日渐提高。

邹韬奋后来回忆:“我在《学生杂志》里投稿也不是完全顺利的,总是投了好几篇才登出一篇。登了一篇之后,好像替我打了一个强心针。”即便屡遭退稿,他从不怨怼编辑,反倒早早体会到了“做编辑的苦衷”。

邹韬奋这段青年时期的投稿经历,为日后创办《生活》周刊锤炼了求真务实、坚持“为大众发声”的精神底色。

时小明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

“家长”沈钧儒

1948年秋,几位先期抵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相聚马迭尔宾馆,彼此问候间,大家频频以“家长”称呼沈钧儒。这一称谓源自一段铁窗岁月。

1936年11月,沈钧儒与章乃器、邹韬奋、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先后于上海寓所被捕。在苏州狱中,为避外界政治猜疑,更显内部团结,邹韬奋提议,不称沈钧儒为“领袖”或“会长”,改以“家长”相称,其余人则互称“难兄难弟难妹”。从此,“家长”便成了他在同仁间最亲切、最受尊敬的称号。

沈钧儒确有“家长”之实。他最年长,虑事周详,任劳任怨,不仅照料同侪,更常顾全大局,因而赢得各方敬重。在哈尔滨时,他每日早起晚睡,从政事安排到生活细节,无不细心关照;教大家做按摩操,叮嘱吃饭细嚼、多叩齿、勤走动,温煦如一家之长。

然而这位一贯关心他人的“家长”,在哈尔滨时却遇到了自己的“麻烦”——一颗龋齿频频作痛,冷热皆忌。因行程紧迫,他忍着牙痛赶赴沈阳。时近春节,沈钧儒果断道:“不能让它跟着过年。”腊月二十四南方小年清晨,他毅然拔除病齿,笑称此为“除旧布新”。

事后,沈钧儒特作《拔牙诗》以记:

有毒除宜急,连根拔勿疑。
决心全在己,审术自需医。
纵有纤微苦,应从久远思。
齿牙何足算,凡事尽如斯。

这首小诗,表面记生活琐事,内里却气象万千。特别是末句“凡事尽如斯”,既是他个人修身律己的豁达感悟,也是对时代大潮的呼应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周星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